

炎帝文化研究

◇主编 王俊义

第二辑

专论

走出『中西古今』之争 融会『中西古今』之学

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

鄂伦春族狩猎文化与经济发展研究

思潮与学派

清朝对蒙古的儒学教育政策

会通古今中西文化的先行者王国维

社会习俗

略论晚清社会风尚的地域差异

海外中华文化研究

日本寺庙藏汉籍珍本书追踪纪实

中西文化交流

明清时期的北京教堂与中西文化交流

学术动态

中西会通与文化创新



大象出版社

炎帝文化研究

◇主编 王俊义



第二辑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炎黄文化研究. 第2辑/王俊义主编.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5. 6

ISBN 7-5347-3830-X

I. 炎... II. 王... III. 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7417 号

责任编辑 吴韶明

责任校对 霍 艳 王 波

封面设计 高 岚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制 版 郑州艾乐出版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88 千字

印 数 1—2 000 册

定 价 32.5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商城路 231 号

邮政编码 450000

电话 (0371)66202901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	任	张文彬				
委	员	王 才	王志光	王俊义	方克立	冯广裕
		曲英杰	曲润海	李尚英	张文彬	张岂之
		耿相新	黄爱平	鲁 淳	漆永祥	
主	编	王俊义				
副 主 编		王 才	李尚英			
编辑部主任		李尚英				

目 录

费孝通学术风范永存	鲁 译\1
-----------------	-------

专 论

走出“中西古今”之争 融会“中西古今”之学	汤一介\19
-----------------------------	--------

炎黄二帝及其时代研究

《东方大帝》出版笔谈	\20
文化含量厚实 读来引人入胜	曲润海\20
以文艺作品讴歌轩辕黄帝的前驱先路之作	王俊义\22
让“消失的生命重返人间” 以“启示当今时代”	罗 琨\25
大有光彩 小有遗憾	白 烨\28
从《东方大帝》说黄帝情结	刘志琴\30

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

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创立过程、内涵及其影响	邱永君\33
鄂伦春族狩猎文化与经济发展研究	刘晓春\47
论楚民族精神	刘玉堂\59

思潮与学派

王仁俊、罗福颐对有关西夏文献的整理	胡玉冰\66
性情:儒学信念本体与宗教性的双重建构	余治平\73
《元代文化史》绪论	陈高华\84
谈《四库全书》	陈祖武\94
卢见曾与乾嘉学派	曹江红\100
学派、学风与学术传承	胡振宇\109
清朝对蒙古的儒学教育政策	赵云田\111
徐松与嘉道西北史地研究	郭丽萍\121
会通古今中西文化的先行者王国维	乐黛云\135

文化丛谈

加强名人故居保护 , 传承中华悠久文明	张文彬\149
---------------------------	---------

南北普陀与观音文化	贺庆升\152
略论清朝入关前对汉文化的吸收	史革新\158

社会习俗

略论晚清社会风尚的地域差异	孙燕京\170
---------------------	---------

海外中华文化研究

日本寺庙藏汉籍珍本书追踪纪实	严绍璎\187
罗素欣——俄罗斯汉学第一人	阎国栋\218

中西文化交流

明清时期的北京教堂与中西文化交流	冯佐哲\229
------------------------	---------

中华学人

纪念王振铎先生	李 强\238
---------------	---------

文献整理与研究

中国传统经济史学视野下的《齐民要术》	王志刚 王 平\250
明代建文史籍的编撰	杨艳秋\257
傅维鳞《明书》体例评析	武玉梅\267

探索与争鸣

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 ——从《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谈起	刘海年\276
--------------------------------------	---------

书评与序跋

评《唐代文化》	王永平\283
读《明实录研究》	张 星\287

学术动态

近代中华书局研究述评	周其厚\291
中西会通与文化创新 ——“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第三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阎纯德\300

费孝通学术风范永存

◇鲁 璋

2005年4月25日,噩耗传来,我们尊敬的费孝通会长,于前一天晚间仙逝,享年95岁。尽管半年多前费老住院后不久,他的家人就对我们说,由于年高病重,老人家这次怕是难出院了,但大家还是期待着奇迹发生,期待着能有机会再次聆听他那带着吴江乡音的学术演讲和亲切谈话。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我随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几位同事来到费老家中,在他面带微笑的遗像前,献上花篮,鞠躬默哀,往事一一浮现眼前。

在“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发起会上指出: “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挑战”

费老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于1991年成立后不久,即受聘为顾问。在1998年6月第二届理事会全体会议上,费老以88岁高龄当选会长。大家对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领导研究会工作,非常高兴。晚年的费老仍风尘仆仆于各地调查,不知疲倦地思考写作,同时还以极大热忱关注着研究会的发展。这六七年来,研究会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学术活动,每步入一个新台阶,都与费老密不可分。我因在会里担负日常工作,对此感受尤深。

就在这年12月,费老热情地出席了我会与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共同在香港主办的“中华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于我会首次在境外举行大型会议,费老极为重视,不仅与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等一起出席开幕式,还在大会上宣读学术论文《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费老谦虚质朴的开场白,至今言犹在耳:“我自从参加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以来,一直觉得自己对我们常说的中华炎黄文化,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炎黄文化,缺乏深刻的认识,一直想找机会向学者专家们请教学习。”^①

费老在这篇经过深思熟虑的论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在20世纪向21世纪过渡的关口,世界日新月异,各个文化都面临着改革的选择,历经着和面临着不断的挑战,中华文化也面临一个推陈出新、继续发展的课题。他认为这个问题

^① 《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第403页。

“事关存亡续绝”。为此,费老再一次呼吁要有“文化自觉”,并给以严谨的定义:“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①

在这次研讨会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发起成立“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得到与会海内外学者的热烈相应。费老对“论坛”始终寄予厚望,给以大力支持和及时指导。论坛一年一度的小型暑期学术座谈会他都参加,谈他新近调查的切身体会和所作的文化思考,与大家一起切磋论坛下一步的研讨课题;每两年一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前,他都紧密结合自己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观察,从文化视角加以分析,认真准备自己的学术论文。费老的学术谈话和学术报告,为论坛和研究会指明了方向;他在海内外的崇高声誉,为论坛和研究会扩大了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对于中国“三级两跳”的文化思考: “要顺应潮流,一边补课,一边起跳”

1999年夏天,我会一年一度的暑期学术座谈会在大连举行,在费老亲自指导下,与会者共商即将举行的论坛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事宜。大家一致同意来年的会议以“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为主题,邀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主办。2000年10月,论坛首次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海内外100余位学者与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同志发来贺信。

正值新世纪来临、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之际,费老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做了题为“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的学术报告。费老在报告中,从自己亲身经历的社会变迁讲起,并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比喻做出学术、理论的提升与概括。他说:“我这一生经历了20世纪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各个时期。这段历史里,先后出现了三种社会形态,就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这里边包含着两个大的跳跃,就是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我概括为三个阶段和两大变化,并把它比做‘三级两跳’。”^②

费老指出,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属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并且后来而暂未居上,现代化进程一再被延误。改革开放以来,急起直追,现在出现了我们在第一跳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已经不能不进行第二跳的局面。这种局面来之不

① 《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第404页。

② 《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第320页。

易,应当倍加珍惜,同时更须深入思考,盲目地进入潮流是不行的,“要顺应潮流,一边补课,一边起跳”^①。他指出:“实际上,我们与西方比,缺了‘文艺复兴’的一段,缺乏个人对理性的重视。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补课,这决定着人的素质。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很快,没有很好的素质,就无法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是个文化问题,要更深一层去看。”^②的确,对于文化问题,费老是看得很深的,总是把它与人的素质、国家命运、人类前景联系起来。

在这个报告中,费老还从中国文化的许多优秀传统至今在世界上仍有其重要价值,谈到我们要有“文化自信”,这也是“文化自觉”的重要方面。他说:“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一大特征,是讲平衡和谐,讲人己关系,提倡天人合一。”^③中国古老的“和而不同”观念仍有强大的活力,现代人类提出的准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所提倡的。因此他认为,我们应当“树立起应有的文化自信”。他指出:“文化自觉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把这个话放在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年会上讲,我觉得应该有更充分的理由表达一种愿望,就是希望中国文化在对全球化潮流的回应中能够继往开来,大有作为。”^④费老在国际会议上,一再肯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价值所在,对于我会全体同仁是莫大的鼓舞与鞭策。

“历史是出戏,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

《炎黄春秋》批判地记载了历史”

《炎黄春秋》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于成立当年就创办起来的纪实性期刊,费老也给予经常关注,并欣然应聘为杂志社顾问。

2001年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及其主办的《炎黄春秋》成立十周年,5月26日在研究会举行的庆祝大会上,费老致词说:“这个研究会的成立,不仅表示我们大家对自己的悠久文化更加关注和重视,而且愿意通过组织起来对它进行研究,这就是我一向所说的文化自觉。”他把研究会的工作上升到“文化自觉”的高度,使我们心胸豁然开朗,眼界更加宽阔。7月21日,他又参加了《炎黄春秋》杂志社庆祝十周年座谈会。他结合这个杂志的特点和风格,对杂志社坚持实事求是、以史为鉴、秉笔直书的办刊方针,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费老说:“历史是出戏,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我们都走过了几十年,参与了时代的变化。《炎黄春秋》批判地记载了历史,它是一面镜子,它说了真话,反映了真实情况。

① 《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第326页。

② 《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第327页。

③ 《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第327页。

④ 《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第329页。

我们通过《炎黄春秋》再次认识了过去的人和事。大家都爱看《炎黄春秋》。认为它办得不错,希望继续办下去,办得更好。”费老这两次谈话都不长,意蕴却很深,引导着研究会和杂志社全体同人满怀信心地跨入第二个十年。

转眼到了2002年炎热的夏天,研究会又为下一次论坛会议而加紧筹划。6月12日下午,我和研究会几位负责同志来到费老家中,向费老汇报论坛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情况,并请费老在健康允许的条件下,出席即将在8月于八达岭举行的暑期论坛座谈会,特别是12月在香港主办的研讨会。费老在仔细倾听后,笑容满面地说:“前一段我对香港会议的内容作了思考,现在正在准备香港会议的文章。香港会议是我今年的一件大事,只要我身体吃得消,一定带着文章去,8月的座谈会也去。会里其他我能做的什么事,一定做。会里的事,我尽力支持,支持到底。”他那坚定的语气和慷慨的承诺,怎能不令人信心倍增!

在“从实求知”的学术道路上毕生探索的结论: “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

2002年12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共同主办的论坛第二次会议,以“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为主题,在香港举行。这是我会以费孝通会长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为主题,在境外开的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我和会里的同志都为此感到高兴、欣慰和自豪。

遗憾的是,费老出席了8月举行的八达岭暑期座谈会后,却因病未能出席12月的香港论坛会议。他事先认真准备的学术论文《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只能请人代为宣读。在这篇论文中,他回顾了自己提出“文化自觉”理念的背景和经过,实际上也是他晚年对自己一生学术历程的回顾与总结。

费老说,“文化自觉”这个名词,是他1997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闭幕发言中“冒出来的”,但是它的思想来源很早。“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上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我们熟悉的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先生都在其内。”^①

他回顾了19世纪中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出,到五四运动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的旧文化,随后是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马克思主义得到不少青年的信仰。到了抗日战争,国难当头,暂时使争论停顿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然而历次政治运动在“破旧立

^① 《费孝通文集》第十六卷,第55页。

新”的口号下,把“传统”和“现代化”对立起来,“文革”时达到了顶点,使人以为中国文化这套“旧东西”都没有用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有所反思。据此,他强调我们要搞清楚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不可能割断历史的。

“学习社会人类学的基本态度就是‘从实求知’。”^①费老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其实,所谓“从实求知”,就是科学的态度,老实的态度,做任何学问都应抱持的态度。“文化自觉”就是在中国这个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他经过一生努力从实际中求得的真知灼见。实际上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文化自觉首先面临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要了解和认识世界上其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②

2003年8月中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太原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03暑期太原论坛暨晋阳文化座谈会”。令人惊喜的是,93岁高龄的费老又兴致勃勃地到会了。费老在第一天举行的“晋阳文化与民族精神”学术座谈会上,讲到1995年到山西考察的情景,他语重心长地说,山西是个中部省份,研究山西文化,就要研究如何在西部大开发和沟通东西部文化中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同时要进一步研究晋阳文化的思想理论基础。在第二天讨论将于2004年举行的第三次论坛会议的筹备工作时,费老对下届论坛我会与澳门大学等单位共同在澳门主办,以“中西会通与文化创新”为主题,予以首肯。他说,我们真心地希望中西文化的交汇、融通,既要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也要批判地对待自己的文化。并且指出,近数百年来,西方文化到中国来,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个地点就是澳门。他还高兴地谈到,改革开放以后,他开始第二次学术生命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正是澳门大学授予的。所以,他希望明年能去澳门参加论坛会议。

然而,费老又因病而未能像大家期待和他自己希望那样出现在澳门论坛会议上。太原会议也成了他参加研究会和论坛的最后一次会议。住院半年多以后,费老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一代学人风范永存

费老一生阅历丰富,贡献巨大。他既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又是卓越的社会活动家,还是多有创见的思想家。他的生活实践和学术理论,值得很好地研究与学习。他晚年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工作中,不仅留下了宝贵的学

① 《费孝通文集》第十六卷,第59页。

② 《费孝通文集》第十六卷,第64页。

术著作和学术思想,他的学术风范影响更为深远。我最难以忘怀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为国为民的治学目的。费老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明确,到了晚年更加突出。从“志在富民”到“小城镇大问题”,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到“世界文化多元共生理念”,从“三级两跳”到“文化自觉”等等,这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无不把自己的学术志趣与人民富裕、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以至人类前途紧密联系起来。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做到了生命不息,调查不止,学习不止,思考不止,写作不止。费老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岗位上退下来后,出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已是耄耋之年。可是他仍然为他所钟爱的学术事业孜孜以求,珍惜晚年的有限时光。几乎在我们每一次见面时,都听他谈到自己来日无多,想要再多做些事情的心情。1957年以后,他中断学术工作20余年,他说:“我在70岁时重新开始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进入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当时预计还有10年的工作时间,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多做些工作。”^①庆幸的是,他又紧张地工作了20多年,获得了世所公认的新的重要成就。

在1998年第一次参加我会在香港主办的研讨会时,费老就说:“我衷心支持和愿意参加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因为我相信这个研讨会不仅能满足我个人急迫的学习上的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适应我们的中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实际需要。”^②他在国内外多种场合,不遗余力地反复呼吁世界各个文化应该和谐相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③,在这次会议上又讲到他的这四句话,并且满怀期待地说:“看来21世纪将开始出现‘人类文化的自觉’了。在新一页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应该有中华民族实现文化自觉的恢弘篇章。”^④费老就是这样把自己的学术活动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伟大复兴,与世界文化多元和谐的崇高理想融为一体的。

二是虚怀若谷的治学态度。费老从少年时起就从事写作,七十多年笔耕不辍,真的是著作等身。到他去世时,仅已出版的16卷《费孝通文集》,就约有500万字。他的学术成就享誉中外,获得国际社会的推崇和尊重。可是他总是说自己学术上不足。“在九十岁那年,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就是决心‘补课’。这是因为这几年社会变动得太大、太快,在这个大变动面前,我的能力不够了,究其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基础没有打好,所以要补一补社会学的基础课。”^⑤身为九十

① 《费孝通文集》第十六卷,第59页。

② 《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第403页。

③ 《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第327页。

④ 《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第405页。

⑤ 《“补课”问题应引起知识界的注意》,《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第405页。

高龄的学术大师,却没有“权威”派头;他曾经担任国家领导职务,却没有任何官气,谦逊朴实,平易近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费老经常谈起他在国内外读书时的几位老师,从他的话里我们能够感受到那种人所罕见的恭谨之情。在一次研讨会上,我们又听他以怀念的口吻,说起他的老师潘光旦先生。他说,在山东孔庙大成殿前,刻写着“中和位育”四个字,可以说代表了儒家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世代相传的基本价值取向。潘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中和位育”作了很好的发挥。位即秩序,育即进步。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潘先生是个好老师,可惜我不是个好学生,没有能在当时充分意识到这套学说的价值,没有在这方面下够工夫。直到晚年,才逐渐体会到潘先生当年的良苦用心,体会到‘中和’的观念在文化上表现出的文化宽容与文化共享的情怀。”^①听了费老如此谦恭地回忆起他的师长,更让我对他肃然起敬。

三是“从实求知”的治学方法。费老终生践行了他自己定下的“从实求知”的信条。从上个世纪30年代与新婚妻子在蜜月中间赴广西瑶山进行社会调查,将调查所得资料整理出版《花篮瑶社会组织》,到留学英国期间出版英文专著《江村经济》,1942至1943年访美期间整理和出版《云南三村》,直到1992年出版《行行重行行》,都坚持走这条为学之路。

费老的“文化自觉”思想,也是从实地调查中首先接触到这个问题,经过思考后提出的。他多次对我们谈到,20世纪80年代末他去内蒙古鄂伦春族聚居地区考察,看到这个民族由于长期在森林中生存,世世代代传下了一套适合林区环境的文化,以从事狩猎和伺鹿为生,近百年来由于森林的日益衰败,威胁到这个现在只有几千人的小民族的生存。90年代末又到黑龙江考察只有几千人的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他想,中国10万人口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就有22个,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他们如何长期生存下去?特别是跨入信息社会后,文化变动那么快,他们就发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费老认为他们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善于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由此他看到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我说‘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②。

可见,费老的学术研究,不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而是从实地调查开始,再进行学术提升和理论概括,然后又回过头来指导现实活动。他每年都花大量的时间,跑农村、下工厂、到城镇、进社区、走边疆、住少数民族地区。他既与国内外大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切磋学问,又同各地干部、群

① 《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第327页。

② 《费孝通文集》第十六卷,第60页。

众广交朋友。因而他的学术思想始终都很活跃,从来不僵化,并且富有创造性和生命力。

费老走了。我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炎黄春秋》、《炎黄文化研究》的全体同事,将永远怀念他,以他为楷模,把他未竟的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邮编:100720)

走出“中西古今”之争 融会“中西古今”之学

◇汤一介

今天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是在五六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有两次重大的外来文化传入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进程。第一次是自公元1世纪以来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第二次外来文化的传入可以说是自16世纪末,特别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两次重大外来文化的传入大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罗素曾在他的《中西文明比较》一文中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①上述两次外来文化的传入,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它每一次都使得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它深刻地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为了说明“在西方哲学冲击下的中国哲学发展”,本文打算先回顾一下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

印度佛教(包括它作为哲学思想)传入中国大体上说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1)由西汉末至东晋,佛教首先依附于汉代方术(道术),到魏晋又依附于魏晋玄学。佛教传入中国后,起初相当长一个阶段所讲的内容主要是“魂灵不死”、“因果报应”之类,在中国实有这类相似的思想,故佛教可依附而流行。至汉末魏初,由于佛教经典的翻译渐多,而分成两大系在我国流传:一为安世高系,是小乘佛教,重禅法,时《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等已译成汉文。或讲呼吸守意,而与道家、神仙家相类;或以“五阴”(即五蕴)配“五行”,“五戒”配“五常”,说“元气”即“五行”即“五阴”。这些附会之说自与佛教不相合。二为支娄迦谶系,为大乘佛教,讲般若学。支娄迦谶一系认为人生根本道理最重要的是使“神返本真”,而与“道”合,此已见受老庄思想之影响,而渐依附于魏晋之玄学。盖因玄学讨论的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而佛教般若之“空”、“有”问题与之颇相接近。东晋初,般若学虽有“六家七宗”之分,但其讨论的基本问题仍是玄学的“本末有无”之辨。而僧肇之《肇论》既是魏晋玄学之总结,又是印度佛学中国化之初始。(2)东晋后,佛典翻译渐多,且系统。已见印度佛教与中土文化之不同,

^① 罗素:《中西文明比较》,引自胡品清译《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

而引起两种不同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并在矛盾冲突中相互影响和吸收。从今日保存之《弘明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争论的问题有“沙门应否敬王者”、“神灭、神不灭”、“因果报应有无”、“空有关系”以及“夷夏之辨”等等,且此时期佛道两教的争论则更为激烈,如有“老子化胡问题”、“轮回与承负问题”、“神形与生死问题”等等。但同时可以看到儒、道、佛三家也在互相吸收着。特别是道教大量吸收了佛教的思想,而佛教则容纳了儒家思想的若干成分,此时已有儒士而信佛,如刘勰,有道士而立佛道二堂,如陶弘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说,中国朝野对外来佛教文化采取的是吸收、容纳甚至在某种程度抱着欢迎的态度。(3)自隋唐以后,印度佛教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化,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同时中国文化又深深地改变着印度佛教文化的形态。特别是在儒、道两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若干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例如天台、华严、禅宗在心性问题上融合了中国儒家的心性学说,天台甚至吸收着道教的某些思想,而华严和禅宗无论在内容与方法上都与老庄思想(如“任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宋后,可以说印度佛教融化在中国文化之中(此时印度佛教在印度几乎已经断绝),形成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

以上我们简要地阐述了印度佛教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传入我国的历史,希望能从中得到某些借鉴和启示,以便我们在阐述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时有一个参照系。

西方文化(景教)早在唐朝已传入中国,后因唐武宗灭佛而波及景教。此后景教在中国逐渐消失,而元朝的也里温可教也随着元朝的覆亡而灰飞烟灭了。西方文化真正对中国文化发生影响是在16世纪末,当时传入的主要是西方基督教耶稣会的一些学说。这时的传教士采取的策略是使基督教附会于原始儒家思想(例如利玛窦),而中国之士大夫除个别人(如徐光启、李之藻)归化了基督教外,绝大多数士人或对基督教持反对态度,或以中国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来了解基督教或欣赏西方的奇巧技艺。这点从某个方面看有点像佛教传入之初。至清初,因礼仪之争,西方文化的传入有所中断,而至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如潮水一般地涌入中国。自此在中国出现了长达百多年的“中西古今”文化之争。

清末,“中体西用”开始曾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尔后某些学者对西方文化了解较多,而逐渐有所改变,其中介绍西学最有力者为严复。民国以后,“中西古今”之争仍然不断,袁世凯称帝之前有“孔教会”之建立,以儒家思想排斥、批判西方文化。其后于1915年始有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青年》杂志的争论。大约与此同时而稍后,有胡适与李达钊等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五四运动前后可以说是中西文化论战之高峰。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派和属于实用主义阵营的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联合举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提倡西方的“科学与民

主”。由五四运动引进的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力,自然也会引起“中学”的反击。当时最著名的维护中国传统的学者一是梁启超,一是梁漱溟。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对西方科学的批判虽有广泛的影响,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相当深刻的回应。1923年发生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这次论战表面上看来是以“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科学主义等等)对“中学”(以张君勱为代表的“新宋学”)的胜利而告终,但其结果造成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和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派的分裂。自此以后,在中国文化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激进派、实用主义改良派和维护传统的保守派三足鼎立的局面。发生在20年代末的“哲学问题”论战和其后的“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问题”论战,都表现在“中西古今”之争。1935年,萨孟武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再次掀起大规模的“中西古今”之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抗日,中西文化论战缓和了一些,但仍然发生过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判,以及维也纳学派洪谦教授与冯友兰关于形而上学问题的争论,这些也都反映着哲学上的“中西古今”之争。

1949年后,祖国大陆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随之文化生活也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当时有所谓“一边倒”的政策,全盘倒向苏联,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全盘西化”的表现。这时要求中国思想文化界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日丹诺夫的三个讲话为指导,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大搞所谓“破四旧”,其结果造成祖国大陆的思想文化与世界思想文化的隔绝,使中国思想文化出现了严重的断层。“文革”结束后,虽然在政治路线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争仍然没有停止。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因此必须批判封闭式的专制主义的新老传统的影响。90年代初,在学术文化界有两种思潮逐渐活跃,一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一是“新保守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进入中国,但没有广泛流行,到90年代初突然成为当时中国学术思想特别流行的思潮。原因何在?我认为它的主要作用是为了消解当时文化上的一元化。“六四”以后,北京某报刊出署名文章《多元化就是自由化》,这篇文章对前一阶段的文化多元化倾向进行了批评。当时思想文化界部分学者认为这样会形成我国学术文化上的倒退和封闭,为打破思想文化上的一元化,因而大量引进和阐发“后现代主义理论”。稍晚,大约于1992年在大陆出现了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热”。部分学者有鉴于西方文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或许可以纠正西方文化的某些偏失。1994年6月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署名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一些人宣扬孔夫子、董仲舒,需要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中国哲学新体系”,“不排除有人企图以‘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